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

——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

杨奎松

内容提要 在中国共产党内,是谁最早提出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是谁反对无条件支持国民党,最早主张向国民党右派宣战的?是谁起草了中共四大决议,并在其中高唱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本文认为都是陈独秀。既然如此,那么陈独秀为什么又有所谓三次“大让步”,有所谓《汪陈联合宣言》呢?本文深入考察共产国际特别是苏共中央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当时国共关系的实际状况之后,认为陈独秀未必应当为此承担多少责任。陈独秀1927年确实反对过工农运动“过火”,但这种反对是不是完全错了?本文也作了初步的分析和回答。

关键词 陈独秀 共产国际 中共中央 维经斯基 鲍罗廷 右倾

对陈独秀的一生,至今人们的评价不一。有的是因为观点不同,有的却是因为资料欠缺。国内几乎所有谈及陈独秀生平的文章和著作,都肯定地说,由于他“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而成了“中国的孟什维克”,“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对中国共产党1927年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如果我们连这一时期陈在党内主持工作过程中的许多重要文献资料都不了解的话,焉知他的那些“主义”的背后,没有更复杂的背景?何况,中国共产党自始就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并直接受到莫斯科派来的代表

《陈独秀评论选编》(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3页。

的监督指导,我们又如何知道他没有进行过内部的抗争?

1929年陈独秀曾经发表过一个《告全党同志书》,历数自己当年五度“未能坚持我的意见”,被迫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情形。但共产国际早已给陈独秀的“错误”定性,声称中国革命的失败关键在于党的领导机构中存在着“陈独秀这样一类机会主义倾向最严重的领袖”。于是,什么“右倾分子”、“投降主义”之类的政治名词纷至沓来。陈独秀的辩白,自然引不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直至今日,即使那些为陈独秀鸣不平,高度评价陈是那个牺牲自己、造福中国的“普罗米修斯”的作者们,也仍旧口口声声地说:“我们并没有疏忽他投身革命,尤其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应承担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责任,以及在理顺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关系方面,和在与国民党右翼斗争方面的缺失。”然而,有谁真的能够说清楚,那些“责任”和“缺失”究竟是怎么来的,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陈独秀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是共产国际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党、一个领导人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碰撞或探索?更何况,前些年中俄学者中已经有人在指责陈独秀犯有“左倾”的错误了。于是,陈独秀“左”耶“右”耶,时左时右,亦或“形左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转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394-396页。

布哈林:《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1927年7月10日《真理报》,转见《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1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503页。

参见王观泉《人在历史漩涡中》,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

参见格鲁宁《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1-117页(原文发表于1978年俄文版的《共产国际与东方》);杰柳辛:《中国1925-1927年革命》(原书俄文版出版于1982年),转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4辑,第291-293页;袁南生:《陈独秀等提出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史实的新佐证》,《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2期。

实右'的问题也出来了。

是非对错,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角度,人们难免会有不同的看法。研究陈独秀主持中共工作期间的这段历史,关键在于搞清楚基本史实,即当时究竟发生过什么,它们是怎么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发生。特别是要弄清楚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以便使我们最终能够知道,真实的陈独秀究竟是怎样的。在陈独秀留下的那许许多多文字中,哪些是陈独秀自己的主张,哪些其实是来自莫斯科的意见和决定。近年来,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有所展开,本文即准备在此基础上,作深入一些的探讨。

陈独秀“幼稚”,全党同样“幼稚”

和列宁创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即俄共前身)时的条件比较起来,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无疑要“幼稚”得多。所以毛泽东说,陈独秀就是因为“党在初创时期的幼稚,当了党的总书记”的。说共产党当时“幼稚”,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当年党成立起来了,但党的

1990年,围绕着陈独秀是否要求将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的问题,中国学者中间曾经有过一系列的争论。郑超麟先生也曾加入到争论中来。争论虽然只是就几个基本的史实问题而展开,但已涉及到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矛盾问题,并且至少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退出的主张是“左”倾的,一种认为是正确的。但这些讨论还没有摆脱固有的模式,即陈独秀总的来说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分别见《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2、5、6、9期。笔者同年也曾发表《大革命前期的国共关系与共产国际》(载《文史哲》1990年第6期),具体讨论了1924-1925年间陈独秀及其中共领导人同共产国际的分歧问题。比较深入地讨论到这一问题的,还有国外的部分学者。早先如俄国学者格鲁宁所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中译文见徐正明等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近年如德国陈之宏的博士论文《鲍罗廷与中国革命》。

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32页注。

领导人以及党的其他成员，“理论准备”普遍欠缺。通俗地说，就是大家当时都还不很清楚用于指导俄国革命成功的列宁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而相对来说，陈独秀在当时接受列宁主义则确实是比较早的和比较彻底的。

陈独秀何时开始信仰列宁主义？1920年夏天。这一年的9月1日，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一文，第一次开始大谈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颂扬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俄国革命经验。而就在4个月前，即1920年5月1日，他还在发表文章，声称：他不相信任何人、任何制度、任何学说能够包治百病。仅仅几个月后，他的思想就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甚至，如果我们依据目前所知的情况，相信在1920年6月间，陈独秀等人组织过一个叫“社会共产党”的组织，一个月后又受俄共代表维经斯基的委托，组织筹备“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会议和组织，并成为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如果我们进一步相信它们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或至少在同一时期他还在筹建中共上海发起组等共产主义小组的话，那么，似乎可以认为，陈独秀在六七月间应该就已经开始倾向

陈独秀当时明确讲：“不但马尔塞斯的人口论是这样，就是近代别的著名学说，像达尔文自然淘汰说，弥尔自由论，布鲁东私有财产论，马克思唯物史观，克鲁泡特金互助论，也都是这样。除了牵强、附会、迷信，世界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他并且认为，指望通过废除私有财产来实现人类平等是“未来的空想”，因此，“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希望从分配上下功夫来解决社会上贫富不均问题。分别见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陈独秀：《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新青年》第7卷第4号，1920年3月1日；陈独秀：《我的意见》，《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以及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俞秀松日记》，《上海党史》1991年第7期。

参见拙作《从共产国际档案看中共上海发起组建立史实》，《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4期。

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了。

在很短的时间里,一跃而成为列宁主义者,这在当时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当中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而与其他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不同的是,陈独秀转向列宁主义,并迅速开始用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来考虑问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特殊条件,那就是他曾经有机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从俄共代表维经斯基那里得到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帮助。

维经斯基从1920年5月到上海,到1921年1月回国,他在中国的半年多时间里,与陈独秀的接触和交往超过他认识的任何中国人,时间长达几个月。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不论是组建中国社会主义者同盟,筹建中共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或者是创办《共产党》月刊《劳动者》周刊,以及起草诸如《中国共产党宣言》等重要文件,维经斯基都曾与陈独秀等人密切协商,给了陈独秀十分重要的帮助。因此,从陈独秀《谈政治》一文开始,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随后这段时期“对于政治的见解”,几乎都是从俄国革命经验中得到的。而这些理念和经验,自然都是得益于维经斯基的介绍与灌输。

有一种说法,认为陈独秀当上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很大程度上是凭借了他在五四运动中的声望,而不是他在理论和经验方面比当时党的其他成员更成熟。关于这一说法的可靠性,我们只要比较一下中共一大通过的那个众所周知存在严重缺陷的决议和陈独秀此前的文章,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科书,包括最新出版的中共党史读物都认为,有关中国革命需要“两步走”的思想,中共一大期间基本上还不存在,直到1922年初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党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回国,带回共产国际的意见之后,人们才认识清楚,然后才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确定下来的。但事实并非

如此。

什么叫中国革命“两步走”？简单地说，就是强调中国革命不能一步走到社会主义，必须要先经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民主革命阶段，然后再来搞社会革命。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之所以存在严重问题，也就是因为它完全无视中国当前存在的客观需要，不仅没有提到反帝反军阀的问题，一厢情愿地主张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作为党的基本政治纲领，而且反对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反对共同敌人。是不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当中，真没有人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要首先完成民主革命，然后才能进行社会革命呢？只要仔细地读一读陈独秀1920年9、10月间发表的文章，我们就会发觉，陈独秀实际上早就提出了类似的主张。

陈独秀当时就明确指过：“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无论哪国都是一样，要用他来造成多数的幸福，简直是妄想。”“在最近的将来，不但封建主义要让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让社会主义……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虽是一定的轨道，然这轨道却不能够说必须要经过若干岁月才可能改变方向……俄罗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会主义代替了，封建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必经过长久的岁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当然，“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本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本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后者胜利时，马上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对于他们的要求，除出版、结社两大自由及工厂劳动保护的立法外，别无希望。”

陈独秀上面的话表达了几层意思。第一是肯定历史的进步必

陈独秀：《对于时局的我见》，《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国庆纪念底价值》，《新青年》第8卷第3号，1920年10月10日。

然要经过由封建到共和(即指资本主义),再由共和到社会主义这样一个过程,不能跳跃。第二是强调他坚信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不能谋全体人民的幸福。第三是相信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第一步必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但社会革命未必一定要等着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之后很长时间再来进行,它完全可能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迅速发生。第四是认为在资产阶级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派同封建势力斗争的时候,共产党应该联合民主派,帮助他们反对封建势力。在这里,中国革命要“两步走”的思想,可以说已经呼之欲出了。很显然,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导下,当国民党占据广州,邀请陈独秀前往主持教育委员会的工作时,已经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他,才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

从1920年9月10日,到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的1921年7月,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中共一大却因为维经斯基回俄,陈独秀在穗,通过了一个既不能清楚表达共产党最高纲领,又极端自我孤立,无论理论上还是政策上都明显较前倒退的决议。决议对于中国当前的实际需要一句不提,反而硬性规定所有党员必须断绝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切联系,主张必须对现有的其他政党一概采取攻击的态度。会议虽然仍旧不能不推举陈独秀做领导人,实际上却明显地在反对陈独秀关于应当帮助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不赞成陈独秀继续与国民党合作。不论中共一大会议期

《中国共产党宣言》比较清楚地描述了俄国式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革命手段,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就此所做的说明含混不清,特别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一条,不仅与《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俄国革命的方式大相异趣,而且明显与此后共产党人反对军事革命的主张不同,不知所据为何。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间,与会代表们是否就此有过争论,会议的决议已经清楚地表明,当时全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远较陈独秀更加“幼稚”。在这个意义上,说陈独秀是因为“党在初创时期的幼稚,当了党的总书记”,也是说得通的。

既然全党“幼稚”,中国共产党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自然也要接受共产国际,其实也就是俄国共产党的帮助与指导。除了由中共通过决议,明确承认自己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以外,莫斯科从中共成立之初,就开始向中共中央派出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的任务,就是监督和指导下级贯彻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和意图。共产国际最初甚至规定,党的领导机关的会议,必须有国际代表参加。只是因为陈独秀的坚持反对,此一规定才没有具体执行。但是,在中共,乃至作为中共中央第一任总书记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之间,上下级的、领导与服从的组织关系,则是确定了的。不仅如此,由于数十名各地知识分子初步结合,尝试革命,知识、实践均十分欠缺,因此,他们最初对俄国的经验,甚至对俄国的代表,也只好抱着一种“孔步亦步,孔趋亦趋”的学习心,决心以俄人的理论为理论,以俄人的政策为政策。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有人说陈独秀一开始就向共产国际闹独立,从上面的情况看,这恐怕也有些言过其实。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等编译:《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

关于早期闹独立性的问题,仅见于包惠僧的回忆,但颇不可信。比如,包不止一次提到陈独秀因担心被人指为“卢布党”,因而反对拿莫斯科的钱,而事实上从已经披露的陈独秀当年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陈独秀明确认为中国共产党一时间很难自行筹款,因而“希望国际有所接济”的文字。参见包惠僧《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百科知识》1979年第2期;《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年6月30日),等。

陈独秀：“暂时支持国民党”

对俄国人“孔步亦步，孔趋亦趋”，当然不是说双方之间没有矛盾、没有冲突。许多人都回忆过陈独秀的性格，对他的“家长作风”印象深刻，尤其蔡和森关于陈独秀对CY中央的一个决议“大发雷霆，碎之于地”的描述，人们更是耳熟能详。甚至有人极而言之，称陈独秀是“性格刚毅，意志顽强，脾气暴烈，桀骜不驯”。不管陈独秀的性格是否真的到了“脾气暴烈，桀骜不驯”的程度，他对共产国际不会完全服服贴贴大概是真的。

有记载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第一次冲突，是因为国际代表马林1922年春“提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马林建议的前提是，这个只有几十个人的共产主义小组织，“若不在组织上同国民党结合，他们的宣传前景暗淡”。不知道陈独秀与马林是否为此有过口舌冲突，至少马林当时就记下了这一情况，说：他4月间几度同中共领导人谈话，建议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而“我们的同志拒绝这个主意”。“我们的同志”，当然包括陈独秀在内。

如前所述，深知先有民主革命，后有社会革命的陈独秀是不会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35页。关于陈的个性，陈自己也有过公开的检讨。如在中共三大的报告中，他就承认自己“很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72页。

王观泉前引书，第34页。

前引《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Dov Bing 与 Muntjewerf 和 Adrian Chan 在 *China Quarterly* (No. 54, 56) 上曾激烈争论有无第一次杭州会议的问题，从 Dov Bing 的答复中和现有资料中，都看不出这一次讨论是在杭州进行的。

拒绝联合国民党的。他从广东回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之后，就不止一次地表示过赞同联合战线的政策，主张同这时唯一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就在他反对马林建议的同时，他还在写文章呼吁劳动阶级要援助国民党革命成功。他之所以反对马林的建议，纯粹是因为把自己变成国民党党员，必然要以服从国民党的领袖和主义为条件，这难免要束缚中国共产党人的手脚，损害其利益。正如他得到马林的建议后，写给这时已回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的维经斯基的信中所说的：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都不同，国民党联合美国，甚至联合张作霖、段祺瑞等军阀，与共产党反帝反封建军阀的主张太不相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受其束缚，绝不可能。

但是，这时共产党只有几十个人，要想推动中国革命，非联合在南方有相当影响和基础的革命的国民党不可。为此，陈独秀不止一次地写文章呼吁，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来华后也向孙中山提出了国共两党党外合作的主张，却均被孙中山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合作这种形式，实际上已经成了实行国共两党联合战线的几乎唯一的途径了。

1922年8月12日，马林从共产国际带回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的指示，再度劝说陈独秀和其他中共

陈独秀：《告做劳动运动的人》，《先驱》第7号，1922年5月1日。

关于陈独秀多次赞同或主张同国民党人合作的情况，可参见《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1922年5月2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88页；《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年4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31页。

前引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陈独秀显然对党外合作的前途也感到了绝望。他在6月30日给维经斯基的信中明确讲，与孙中山联合的希望很小。

见《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0页。

领导人赞同党内合作。8月28-30日,马林和中共中央领导人进一步在杭州西湖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最终通过了党内合作的方针。不难想象,陈独秀等人对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未必十分理解,但现实条件的困难,以及共产国际指示的权威性,都促使陈独秀等不能提出重要的反对意见。尽管如同陈独秀在一年以后的报告中所说,“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但马林当时的笔记却显示,更多的讨论其实是在会前,会上的争论已不严重。他写道:除了广州方面以外,“我们团体内没有重要的反对意见”。

不论陈独秀是否对加入国民党仍旧心怀疑虑,他几乎马上就参加了国民党,并成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会的成员。颇能反映此后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特点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陈独秀很快接受了马林的说法,开始公开宣传说:“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哪一个阶级的。”“国民党虽然有许多缺点与错误,然终为中国唯一革命的民主派,自然算是民主的联合战线中重要分子,在国民党为民主政治及统一政策斗争时期,无产阶级不但要和他们合作参加此争斗,而且要在国民党中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及为工人阶级利益与自由的口号,以扩大其争斗”。他并且承认:“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然而,宣传归宣传,这并不等于说陈独秀根本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要“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了。只要看一看他1922年11月前后在莫斯科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69页;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笔记》,同上引书,第92页。参见只眼《国民党是什么》,《向导》第2期,1922年9月20日;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目前的策略》(1922年11月),《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93-94页。蔡和森坚持说:“这时马林提出‘一切工作到国民党去’的口号,甚至认为不要共产党的右倾主张,仲甫是赞成他的。”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1926年),《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47页。

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对国民党所做的分析,和为中国共产党规定的任务,就可以了解到这一点,即他并非如我们许多文章所说的,一下子跳到了另一个极端。

他当时写道:国民党员百分之七八十是知识分子和小商人,只有百分之二三十是工人,主要成员都是钻营家和官僚,只有孙中山一人算是真正的革命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是“暂时支持国民党”。我们加入国民党,为的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纠正这个党接近张作霖和日本的错误,“向国民党内工人分子宣传促进他们阶级的觉悟,使他们了解国民党终非为无产阶级利益奋斗的政党”。因为中国工人是共产党的基本依靠力量,而工人运动前景广阔,深受压迫的中国工人甚至会比先进国家的工人更具战斗精神。因此,根据他的归纳,由刘仁静在共产国际四大宣布的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任务,概括起来其实就是:第一,通过对国民党内工人的宣传,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第二,摆脱孤立局面,把群众团结到我们周围,一面向帝国主义斗争,一面分化国民党。

真的按照陈独秀的上述方针来指导共产党人,大概是很难适应国共党内合作这一特殊形式的。需要注意的是,陈独秀的这些说法并没有受到共产国际的任何批评。不仅如此,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共产国际这段时期有关中国问题的指示,就不难发觉,共产国际其实同样赞成把争取工人群众当作共产党人的头等重要的任务。即使是在马林1922年8月带回来的那个国际指示当中,也是突出强调要组织劳动群众,建立工会,争取国民党内的无产阶级分子和手

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目前的策略》,并见《刘仁静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2-63页。陈独秀率刘仁静、王荷波前往莫斯科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陈独秀同时还提交了有关中国工人运动、农民状况、统一战线以及中国当前政治形势等4份报告。

工业工人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12 月 5 日就中国问题通过的决议,更是明确主张:“共产党人应该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用于组织工人群众,成立工会和建立坚强的群众性共产党方面。”决议对国共合作的问题几乎一句没提。这同共产国际后来的方针有极大的差别。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陈独秀,还是共产国际,他们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其实都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的。

陈独秀真的打算“二次革命”?

要求中共将主要注意力都用于发展自身,这未免与共产国际刚刚确定的联合战线政策有些矛盾。由于回莫斯科述职的马林坚决反对,一个月之后,即 1923 年 1 月 12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又专门就国共关系通过了一个决议。决议一上来就宣称:“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尽管决议再度重申了共产党人要加紧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的观点,但强调的重点已经明显变化,原来要求共产党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这方面,如今则强调,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只是共产党人“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它并且特别提醒中共中央说:由于中国的“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共产党需要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该留在国民党内,并且,共产党应避免同民族革

前引《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80- 81 页。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22 年 12 月 5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 1925)》(1),第 163 页。

命运动发生冲突。

一面强调民族革命是中心任务，一面要求共产党仍旧要把组织工人当成“重要而特殊的任务”；这无疑给中共中央出了一个难题。

其实，关于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需要实行联合战线的观点，与陈独秀的看法并无太多矛盾。问题在于，共产党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什么，是加紧在革命的过程中为社会革命的目的组织无产阶级，还是全力去帮助资产阶级首先实现民族革命？

自建党伊始，陈独秀就认定，落后于俄国的中国，一定要按照俄国革命的方式进行革命，即共产党先帮助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成功二月革命，再联合工农成就自己的十月革命。他几度公开发表文章，说明中国革命之所以要两步走，就在于“中国产业之发达还没有到使阶级壮大而显然分裂的程度，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只不过，陈独秀一直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幼稚，资产阶级也同样幼稚。而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远远大过资产阶级，两阶级联合进行国民革命的结果，无产阶级的力量最后势必大过资产阶级，国民革命成功后，紧接着自然是一场“十月革命”，“资产阶级决难坚持独厚于自己阶级的经济制度”。也正因为如此，他一直认为，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应该放在争取和组织无产阶级，壮大自身力量的基础上，以便民主革命成功时，即可在最短时间一举而成就社会革命。共产国

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76-77页。

见独秀《国庆纪念底价值》，《新青年》第8卷第3号，1920年10月10日；独秀：《答张东荪》，1922年9月17日《时事新报副刊》；独秀：《造国论》，《向导》第2期，1922年9月20日。并见陈独秀《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1922年8月26日《民国日报》。

际转而突出强调民族革命,这与陈独秀最初的观点显然多少有些差别。

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被直系军阀吴佩孚残酷镇压,国内舆论与社会对此竟没有太强烈的反响,对京汉铁路罢工负有领导责任的共产党人因为自身力量太小,虽义愤填膺,却也一筹莫展。这一事件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有它一定的道理:必须首先集中全力打倒封建军阀,否则难有组织训练工人群众、实行阶级斗争的有利环境。

“二七”惨案之后,国际代表马林写信尖锐批评共产国际根本就不该强调在中国建立“群众性的共产党”,说这纯属“幻想”。当然,马林未必真的主张取消共产党在组织上的独立性,他其实只是希望共产党人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

来自共产国际和马林的影响,也促使陈独秀更深刻地体会到走好革命第一步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劳动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目前工作,首先要做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而“要成就一个革命的局面,断然不可没有一个势力集中的革命党做中坚,担负破坏及建设的责任。中国民主革命至今未能完成,军阀政治得以存在,唯一的原因,就是民主革命的势力未曾集中。”如今,“凡属民主革命分子,若当真要革命,便应该集合在民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使他成功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党,才有打倒军阀的希望。”共产党人很清楚:“虽然明知此种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

《马林给拉夫斯坦的信》(1923年4月3日);《马林给布哈林的信》(1923年5月3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46、194-195页。

马林在事实上并没有要求中共中央放弃独立性。他不仅鼓励中共中央公开监督和批评国民党的政策,而且自己身体力行地以孙驿的笔名撰文批评国民党。

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至少,在目前还不能直接从事社会革命的情况下,“殖民地、半殖民地幼稚的劳动阶级和幼稚的社会主义者,要想在推翻帝国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中,做他能做的工作,除了国民革命运动,还有何路可走?”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陈独秀与马林结成了统一战线,突出强调国民革命的重要性,强调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到推动国民党左倾的工作上来。三大通过的决议反映了共产国际的观点,即一面强调保存党的组织,努力从工人群众,包括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有觉悟的革命分子,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一面解释说:由于工人阶级尚未强大,不能发生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党员应当加入国民党。而整个决议的中心在于说明:“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的大本营”,故“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

过多地注重国民党,并且把整个工作的重心放到发展扩大国民党的问题上来,也难免产生陈独秀过去曾经担心过的问题,即使共产党人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11月,中共三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一面坚持:“我们的同志在国民党中为一秘密组,一切政治的言论行动,须受本党之指挥”,并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一面又叮嘱说:这一切作法要自然,“事实上不可能时,断不宜强行之”。可见,涉及到任何可能引起国民党反感的行动,中共领导人都

独秀:《怎么打倒军阀》,《向导》第21期,1923年4月18日;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22期,1923年4月25日。

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问题》(1923年5-6月)。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46-148页。

开始变得小心翼翼了。

中共三届一中全会的顾虑,不是没有原因的。陈独秀等人当初之所以反对加入国民党,很大程度上就是担心会因此受到国民党的纪律束缚。而中共三大刚刚开过不久,孙中山和广州的国民党人就因陈独秀等在《向导》等刊物上批评国民党而大起纠葛。孙中山甚至当着马林的面提出警告,扬言陈独秀若再不收敛,就要把他开除出国民党。面对这种局势,中共中央自然不能不通过决议,决定避免在报刊上过多刺激国民党。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0月,苏联顾问鲍罗廷到达广州,孙中山开始启动国民党改组工作,一批国民党元老又再度借机抨击陈独秀“欲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结果又引起新一轮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除在三届一中全会上通过决议,强调谨慎以外,陈独秀还不得不发表文章,公开表示共产党纯以国民革命为重,并无社会革命之计划。他表示说:“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若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如俄国1917年从二月革命迅速演变为十月革命。“但是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陈独秀的这段说法,简单地归结为所谓“二次革命论”,批评陈独秀想要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有了充分

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200-201页;《国民党代表大会中共党团领导小组会议纪要》(1924年1月17日)。

参见《马林致达夫谦和越飞的信》(1923年7月20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96-297页。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2号,1923年12月1日。

发展后再谈社会革命。事实上,这样的观点在逻辑上未必有什么错误,因为俄国的二月革命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克伦斯基取得了政权,然后再由布尔什维克发动夺取政权的十月革命的。何况,即使在上面的表述中,陈独秀也并没有断定将来中国的二月革命不会迅速演变为十月革命。联系到在他主持下刚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人应“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的决议,注意到他在文章中虽然是含混地,却是特意地强调了彼时“也许有新的变化”,足以看出陈独秀这时其实并未放弃取得国民革命领导地位和希望迅速实现“十月革命”的愿望。他之所以没有像过去那样断然地否定存在着资产阶级建立稳固政权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像上面的文章本来就是为了解除国民党人的疑虑而做的,不能不讲得比较含混些。我们很难简单地把它同所谓的“二次革命论”划上等号。

关于这一点,只要比较一下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的一些谈话就能够了解。毛泽东曾多次讲:未来只能是与国民党一道,并且是以国民党为主体来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共和国,用毛泽东后来的说法,就是“独裁加若干民主”,领导权多半仍旧在国民党手里。他开始时甚至讲,那时不用十月革命了,到一定时候要不要搞社会主义,大家开个会讨论讨论,“通不过,慢慢再来”。很显然,没有人因为毛泽东一度讲过这样一些话,就认为他右倾,或是说他主张“二次革命论”。其实,出现这种情况多半只是因为陈独秀、毛泽东他们认识到当时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因而对未来前途的估计变得比较实际一些而已。而且同在1923年,身为陈独秀(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也不止一次地谈到,以中国当时的落后,共产党

胡华:《试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发展》,《陈独秀评论选编》(下),第65页。

毛泽东:《两党合作问题》(1938年4月5日)。

不可能成为群众性的政党。中国商人的作用较工人、农民“尤为迫切和重要”，强调“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大，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

陈独秀与鲍罗廷的冲突

陈独秀是不是准备“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是不是从此把国民党的利益置于共产党的利益之上，准备让“资产阶级”来当权，这一点从陈独秀 1924 年同鲍罗廷的冲突中间，可以看得更清楚。

1924 年 1 月，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全力推动下，国民党成功地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依照俄国共产党的形式进行了全面改组和重建。新设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党部等中央领导机构，其中 1/3 至 1/4 都是中共党员。尤其是负责组织发展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基本上都是依靠中共党员在工作，中共总共只有 200 多名党员，差不多都担负了国民党的重要发展工作。以致从 1923 年 10 月以后到 1924 年 1 月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后几个月时间里，中共自己的活动大大减少，党员人数几乎没有增加。担任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三常委之一，并兼任组织部长的谭平山明确告诉鲍罗廷说：我们的党员无法抽出时间做群众工作，已经失去了同工人群众的直接联系。仅以广州为例，国民党 9 个区委会，64 个支部，党员 7780 人，共产党的干部党员只有 30 余人，目前主持 9 个区委中的 5 个，和 64 个支部中的 13 个，就已经忙不胜忙，自然无暇顾及自

见马林所记毛泽东在中共三大前后的谈话笔记，《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213、236 页；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向导》第 31、32 期合刊，1923 年 7 月 11 日。据陈独秀会前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哈尔滨、北京、天津、湖南、湖北、南京、安徽等地已经以共产党人为主，发起建立了国民党党部。《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3 年 12 月 27 日）。

己组织的发展问题。

对于这种情况, 负有苏联外交部使命的鲍罗廷似乎比较满意。因为在他看来, 共产党的整个组织都“萎靡不振”, 不过是读些小册子然后把它们散发出去而已, 只是在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当中, 他们才变得“人心振奋”和“异常活跃”起来。在莫斯科对中国事务有极大发言权的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也兴致勃勃地称赞中国共产党人有纪律, 说他们没有用任何左派言辞给国民党一大制造麻烦。话里话外不难看出他们对中共的发展不仅毫不关心, 而且生怕中共惹麻烦。但中共领导人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对此却明显不满意。维经斯基就专门向莫斯科报告说: 中共的同志们加入国民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他们花了太多的时间来建立国民党的组织, 因此停止了自己在工人群众中和知识分子中的宣传组织工作, 这是不妥当的。他明确认为: “在国民党内做工作不是目的, 而是手段。”共产党人必须学会在合适的地点和时间国民党工作。

1924年5月, 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 维经斯基在上海召集陈独秀等领导人举行中央执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一反共产国际决议过去关于国民党是一个包含四个阶级的民族革命集团的含混说法, 肯定

《鲍罗廷与谭平山谈话纪要》(1924年1月10日)。

《鲍罗廷关于华南形势的札记》(1923年12月10日); 《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 第368、373、412页。

Tony Saic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Leiden, 1991), pp. 864- 866; 《维经斯基给拉斯科利尼科夫的信》(1924年4月21日),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 第493- 494页。

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类似的说法其实是马林的观点。见前引《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

己组织的发展问题。

对于这种情况, 负有苏联外交部使命的鲍罗廷似乎比较满意。因为在他看来, 共产党的整个组织都“萎靡不振”, 不过是读些小册子然后把它们散发出去而已, 只是在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当中, 他们才变得“人心振奋”和“异常活跃”起来。在莫斯科对中国事务有极大发言权的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也兴致勃勃地称赞中国共产党人有纪律, 说他们没有用任何左派言辞给国民党一大制造麻烦。话里话外不难看出他们对中共的发展不仅毫不关心, 而且生怕中共惹麻烦。但中共领导人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对此却明显不满意。维经斯基就专门向莫斯科报告说: 中共的同志们加入国民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他们花了太多的时间来建立国民党的组织, 因此停止了自己在工人群众中和知识分子中的宣传组织工作, 这是不妥当的。他明确认为: “在国民党内做工作不是目的, 而是手段。”共产党人必须学会在合适的地点和时间国民党工作。

1924年5月, 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 维经斯基在上海召集陈独秀等领导人举行中央执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一反共产国际决议过去关于国民党是一个包含四个阶级的民族革命集团的含混说法, 肯定

《鲍罗廷与谭平山谈话纪要》(1924年1月10日)。

《鲍罗廷关于华南形势的札记》(1923年12月10日); 《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 第368、373、412页。

Tony Saic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Leiden, 1991), pp. 864- 866; 《维经斯基给拉斯科利尼科夫的信》(1924年4月21日),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 第493- 494页。

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类似的说法其实是马林的观点。见前引《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